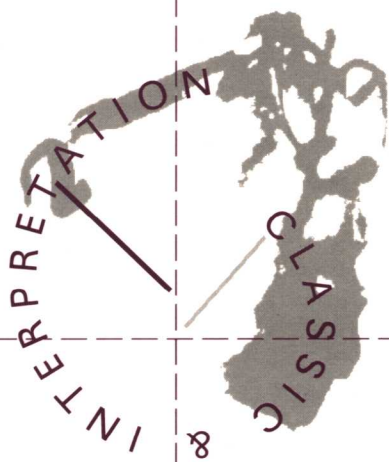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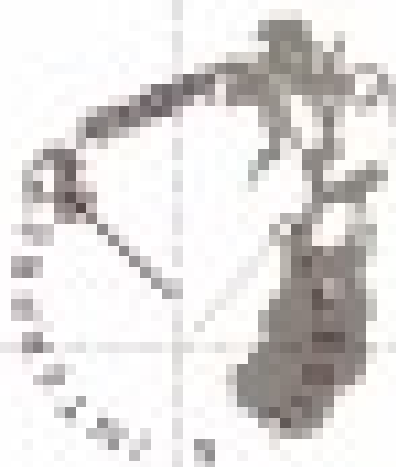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施特劳斯 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施特劳斯 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

威廉斯 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与城邦

莱茵哈特 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陈仲民译 陈仲民著，陈仲民译，陈仲民著

陈仲民译 陈仲民著，陈仲民译，陈仲民著，陈仲民著

陈仲民译 陈仲民著，陈仲民译，陈仲民著

陈仲民译 陈仲民著，陈仲民译，陈仲民著

经典与解释(17)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 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刘小枫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126-1

I. 修… II. 刘… III. 修昔的底斯, C. — 史学 — 著作 — 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814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33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论题: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 2 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施特劳斯(彭磊译)
- 33 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 施特劳斯(彭磊译)
- 52 修昔底德的文风 冯 雷(陈开华译)

古典作品研究

- 81 修昔底德笔下的个人与城邦 威廉斯(陈开华译)
- 117 论修昔底德叙述的结局 韦特格林(彭磊译)
- 141 重思狄奥多图斯的论辩 约翰逊(彭磊译)

思想史发微

- 155 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 莱茵哈特(何晓玲译)
201 韦伯与修昔底德 赫尼斯(朱雁冰译)
250 两汉诸子述左传考(上) 刘正浩
318 贾谊与荀子学术渊源考证 潘铭基

评 论

- 356 评巴特莱特《启蒙的观念》 施道费尔(娄林译)

(本辑主编助理 李致远 刘殷之)

论题：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著

彭 磊 译

这个讲座是“西方传统：伟大的观念和议题”系列的一部分。西方传统今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如今它不仅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还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它正处于分崩瓦解的状态之中。我们之中那些信任西方传统的人，我们西方人——我们 Sapadniks，^①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友人称呼俄国人中的西方人那样——因此必须在西方传统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方式，或许与这一高贵的传统并非不相宜的是，我们至少要记得：我们必须以一种西方的方式来维护西方的原则；我们必须不能在一片交口赞同之声中放弃我们的疑惑。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西方传统的生命力和荣耀与它问题诸多的品性是分不开的。因为西方传统有两个根源。它由两个异质的、最终互不相容的要素组成——希伯来要素和希腊要素。我们正确地谈论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对立，信仰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哲学和《圣经》两者都断定，人有且只有一个终极需要(the one thing need-

* 译自 Thomas Pangle 选编，《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1989)，页 72 - 102。

① 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俄国，爆发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陀氏当时所属的斯拉夫派以“zapadniks”(westernizers)之名称呼那些对欧洲心向往之的俄国人。——译注

ful)。但是,《圣经》所宣称的终极需要恰好与希腊哲学所宣称的终极需要相对立。在《圣经》看来,人的终极需要是顺从的爱;在哲学看来,人的终极需要是自由的追问。全部西方历史可以视为一个不断重复的努力,即试图在这两个对立原则之间达成和解或综合。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均失败了,并且必然失败;不论每一次综合多么令人赞叹,总有一个综合的要素隐微地但却无一例外地成了另一个的牺牲品。哲学违背己意,成了神学的婢女;或者信仰违背己意,成了哲学的婢女。西方传统不准许对它的两个要素进行综合,而只准许它们之间张力的存在:这就是西方生命力的秘密所在。西方传统不准许对这一根本矛盾有最终的解决,不准许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存在。只要还会有一个西方世界,就会有不信任哲学家的神学家,就会有被神学家所困扰的哲学家。在西方传统的旗帜下联合的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这一危险:我们被迷惑或被威逼着走向一种盲目因袭(conformism),而它将是西方传统落寞的终结。

我必须暂且不谈,哲学和神学这两个西方传统之下的原则是否会准许我们以我使用的那些语词来谈论“西方传统”。请允许我宣布:这么做归根到底是不可可能的。但是,想要始终以那些经得起细致推敲的语词来言说则是愚蠢的。大多数时候,一位希腊诗人的诗句可以表达出我们的行为准则:“汝等高雅之物非我所欲也;彼等城邦之需乃我所欲也”(欧里庇得斯,残篇 16, Nauck 编;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7a 19-20 加以引用)。只要我们政治地言说,亦即粗陋地(crudely)言说,我们多少就得以我使用的语词来谈论西方传统。

西方传统的伟大观念或议题之一就是政治史学。哲学或科学是西方传统的特性,启示信仰是西方传统的特性,同样,政治史学也是西方传统的特性。因为西方传统是由两个异质要素组成的,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政治史学属于哪一要素。答案毫无疑问。“政治”和“历史”两个语词表明,政治史学源自希腊而非希伯来。^①

① “politics”源自希腊语“polis”(城邦),“history”源自希腊语“historia”(探索),而且两个词在希伯来语中都找不到对应词。——译注

有人或许会说,政治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力量(human power),但要同情地看待力量。力量是个极不确切的语词。因而让我们更确切的来谈论自由和帝国吧。不错,政治史学假设自由和帝国是(并非荒谬)人类伟大的目标——自由和帝国是令人敬佩的正当目标。自由和帝国引发人之大群最大的努力。这种伟大令人赞叹。每个人都能看到或感受这种伟大,而且每个人的命运都受这种伟大的影响。政治史学的主题是众多而通俗的(massive and popular)。政治史学要求这一众多而通俗的主题能够激起一种众多而通俗的回应。政治史学属于一种多数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生活。它属于一种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属于城邦。只有政治是重要的,政治史学才会是重要的。只有政治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史学才会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史学才会兴盛起来。但是,政治只对那些更想拯救其城邦而非其灵魂的人们(如一些佛罗伦萨人[Florentines]那样)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亦即,对于那些受共和国的德行精神、受城邦精神支配的人们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受城邦精神支配的人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史家”。一位古代的评论者说,政治史家必定是邦外之人(apolis),是无邦之人,是超越城邦之人。^① 政治史家必定不仅仅是个公民,甚至不仅仅是个政治家:他必定是个智人(wise man)。政治史学假设,智人十分看重带着谨慎与同感去刻画政治生活,而且这个假设包含着一个悖论。智人始终会倾向于轻视政治生活,轻视政治生活的喧闹扰攘、绚丽荣耀。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政治生活看得乏味。政治人不断地被迫跟非常乏味的人就非常乏味的话题进行冗长的谈话。近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就是行政管理。至于激动人心的决策部分,则与长期的单调等待——长期的中止行动也中止思考——联系在一起。智人始终会倾向于在政治生活中发现幼稚之处。以政治为严肃对象的智慧,必定是那些孩子般或保持孩子般的人——某种意义上——的智慧。希腊的智人就是这样

① “在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几乎全是流放者,或至少是离乡背井之人”,参见 Arnaldo Momigliano,《传统与古典史学》,载《新史学:古典传统与价值创造》,大象出版社,2003年,页21。——译注

的人。一位埃及祭司对一个希腊人说：“你们希腊人一生都是孩子，你们每个人都有年轻的灵魂；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信念是古代的或起源于古老的传统，也没有一丁点儿年代久远的知识”（柏拉图，《蒂迈欧》22b）。希腊共和主义与希腊智慧的同时到来产生了政治史学。

政治史学假设这一信念：政治活动极其重要；并且还假设：政治活动是一种启迪这一信念的智慧。这是政治史学的必要条件，但却显然不是政治史学的充分条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智人，并且他们认为，政治活动极其重要。但他们不是政治史家。这种产生于政治史学之中的希腊智慧的具体品性何在呢？

我们并不习惯于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把政治史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千年以来的传统使我们习惯了政治史学的存在；政治史学不过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事物之一。许多世纪以来，确实没有迫切需要提出我们提出的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迫使我们比我们的前人要更加小心细致。从18世纪左右开始，史学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史学也不断扩张。政治史学当前只是史学众多分支中的一员，并且丝毫不比其他分支更重要或更核心。今日史学的综合性主题不再是政治的事行和言辞，而是所谓的“文明”或“文化”。人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人的一切——因此特别是哲学。如果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的重要部分，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人把自己从任何特殊的文明或文化的特殊前提中解放出来的努力。

史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使得哲学作为真正自由的追问变得不可理解——它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正当且必需的追求。鉴于那些显而易见而无需陈述的理由，我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并且，由于哲学所受的危险源自史学，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史学的整个问题。这样的史学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史学传统的源头：我们不能把史学传统所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也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最初是什么使得智人们成了史学家？正是抱着这一精神，我们转向了修昔底德。

在西方产生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史家中，修昔底德被认为是最具政

治性的史家、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史家,他最充分地理解并表达了政治生活的本质:现实的政治生活并不是《独立宣言》的原则的应用,而是那些在路易斯安那交易(Louisiana Purchase)中发挥作用的原则的应用——残酷庄严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同时,修昔底德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雅典人——正如他的描写表明他曾是的那样。如果政治史学背后有某种智慧,如果有某种智慧合理地说明了政治史学,那么,在修昔底德的篇章字句中 most 有可能发现这种智慧。

那些富有判断和品位的人对修昔底德心存敬慕,如今人们认识到,作为史学家的修昔底德带有某些实际的或声称的缺陷,这种敬慕因这种认识而受到限制。这一批评可以归结为三点:

(a) 政治史学家被认为是一个刻画特殊情况或特殊事件的人;普遍似乎是哲学家或心理学家这些人性研究者的领地。修昔底德的著作主要致力于描写一系列特殊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它还要揭露政治生活永恒的或不变的品性。鉴于修昔底德称自己的著作是“千秋万世的瑰宝”:通过理解修昔底德对于其时代的政治生活的报道,所有未来的世代都可以来理解他们自己时代的政治生活的真谛。

修昔底德似乎同时既是一个史家又是一个政治哲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使修昔底德的史著异常吸引人,同时也异常惹人烦恼。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何以不得不构造这种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仅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报道何以可能是一个对政治生活的报道。修昔底德叙述了在一个发生于世界一隅且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但他宣称,这次叙述将会使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成为可理解的,并且他没有解释这如何可能。

(b) 没有哪个现代政治史学家会像修昔底德那样来写政治史学。以我所知的最好的美国史学家亚当斯(Henry Adams)为例:他撰写了第一届杰弗逊政府的历史,其开篇当然是描绘杰弗逊接任时合众国的局势。^① 亚当斯相当详尽地描绘了国家当时思想的、社会的、文化的和

^① 指亨利·亚当斯(1838-1918)的《杰佛逊和麦迪逊政府下的合众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一书。——译注

经济的状况。修昔底德几乎闭口不谈这些东西。他把自己严格限制于政治——战争、外交和内乱。是他对其他的东西视而不见吗？这似乎不可能。是他把其他东西——悲剧、喜剧、哲学、绘画、雕塑等等——看得不重要或者至少不如政治事物重要吗？显然如此。但是，他如此认为的理由何在？对此，他并没有说明。

(c)修昔底德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特征。他记录了事行与言辞两者。^①他大体上以现代史学家的方式记录事行或事件。但他自己却创作了言辞。修昔底德宣称他创作的演说辞与实际发表的演说的要旨是一致的。但修昔底德编撰了它们。以当前史学家的观念来看，这是一种伪造。此外，修昔底德是根据一种修辞原则来编撰这些演说：他笔下所有的演说者都像修昔底德自己在演说一样，演说者的个性、地域色彩等等统统阙如。演说并不是“自然的”。它们不是那些激动而无知之人的演说，而是完美演说家的演说，是那些有闲暇、有一流演说训练的人的演说，是那些遵循号称普遍有效的艺术原则的人的演说。

这三项反驳似乎表达了一些主要困难，而这些困难如今正妨碍我们理解修昔底德的作品。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但我们还必须做得比这更多。上述三项反驳都是典型的现代反驳。它们基于这一假设：现代史学家采取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他们依据现代历史编撰学的标准来衡量修昔底德的作品。但是，由于现代史学已经把我们带入了极为严重的困境，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我们的标准。这样的史学对我们而言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毫不犹豫地质疑，我们是否有权把修昔底德的作品说成是一部历史——当然还有，我们是否有权把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或一种一般的哲学归之于修昔底德。在进行一场全新的考察之前，我们知道，修昔底德的写作先于史学与哲学之间任何可能的区分。我们至多可以说：修昔底德的意图就在于，就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给出一个真实的或清晰的或准确的或详尽的报道。并且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一问题，他为何决定写这

① “deeds and speeches”即“言事并重”，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义云：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译注

样一个报道？

修昔底德的下一陈述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特地谈论〔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间隔期〕是因为之前的作家们要么描写波斯战争之前的希腊事务，要么描写波斯战争本身。除了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以外，他们全部忽略了紧跟在波斯战争之后的时期；而赫拉尼库斯在他的《阿提卡编年史》(Attic Chronicle)中触及到这一题材时，叙述得非常简略，并且他的纪年也不准确”（《战争史》I.97）。

修昔底德在这里暗示，希腊人应该对希腊事务做一个连续性的、十分详尽且纪年准确的报道——由一位位作家连续写作的报道。如果史学仅仅意味着这些，那么，修昔底德显然熟知这一史学观念并且也认可它。但问题在于，他自己的作品能否这么来理解。我们就此足以评论说，修昔底德发表这番陈述的目的在于，为他自己不必要的偏离正题而进行解释或开脱；他在交代自己之所以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写作缘由时，可并没有做过这番陈述。如若从修昔底德整部作品的语境来看，这项陈述读起来就像在断然拒斥他所预设的史学观。并且我们也不难理解修昔底德为何拒斥这种低俗的史学观。在交代自己之所以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写作缘由时，他强调了这一事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那种低俗的史学观却并不顾及重要者与不重要者的差异；它对所有的时期，对重要者和不重要者绝对一视同仁。

那么，修昔底德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了他的主题？他在其作品的开头就说，他之所以写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相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值得注意者，它是希腊人卷入其中的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之大不仅是要对这场战争做一个真实而详尽之报道的原因，它还是这个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假如一个人不明白这是一场最大的战争或至少是最大的希腊战争，那么，他就不明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相。修昔底德史著的约前二十章就给出证据表明，伯罗

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战争，这前二十章是这部史著不可或缺的成分，并非仅仅是这部史著的一篇导言而已。

相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战争是一回事，而认识到这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只能通过论证来获得这一认识。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无比“大”性并不是自明的。毕竟，每场战争的同时代人都相信他们的战争是最大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50 年之前发生过另外一场大的战争：波斯战争。实际上，在“大”方面，或许只有波斯战争能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颉颃，并且也确实是个最有力的竞争者。修昔底德在两句话里面处理了波斯战争具有无比“大”性的主张。这个问题似乎得以解决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了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战争这一观点，修昔底德花了十九章的篇幅。很显然，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有另外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还有什么战争会被认为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大呢？答案只有一个：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均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共同事业；均为期甚长；并且均造成了巨大灾难。修昔底德身后的那代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仍然认为，特洛伊战争是最大的希腊战争。因此，修昔底德绝对需要去证明特洛伊战必定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么大。他通过证明古人的贫弱而证明了这一点：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希腊人完全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特洛伊战争的名气主要来自荷马的诗篇。特洛伊战争的威望主要得自荷马的威望；因此，通过质疑特洛伊战争的威望，修昔底德质疑了荷马的威望。修昔底德证明了古人的贫弱——他们在力量、财富、勇气方面的贫弱——，借此，他就证明了古人的故事皆虚假而不可信：他证明了古人在智慧上的贫弱，尤其证明了荷马在智慧上的贫弱。修昔底德也证明了那些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人在这些方面上的优势，借此，他也证明了自己智慧的优势。要不是由于修昔底德的作品，过去时代的吸引力——主要是经由荷马的魅力而提升出的吸引力——将会始终遮蔽住当前时代的优势。修昔底德使我们直面一种选择——在荷马的智慧与修昔底德的智慧之间。像他的同时代人柏拉图一样，修昔底德也在与荷马竞赛。

荷马是个诗人,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诗人(the poet)。诗人何谓?荷马并没有提到“诗”这个词。我们在荷马那里能找到歌手或乐师。歌手或乐师与诗人的区别恰恰在于:诗人被认为是制作者或创造者,有些东西有赖他的制作或创造才存在,尽管这些东西把自己描绘得好像是未经诗人的制作而存在。诗艺就是虚构。与歌艺不同,诗艺预设一种对虚构与真理之别认识,并关注这种区别,亦即关注真理。诗人通过虚构来讲述真理——关于人的真理。这种虚构主要在于夸张和修饰,同时隐瞒关于人的最重要真理。举修昔底德书中的一个例子为证:

我倾向于认为阿伽门农(Agamemnon)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集结起[针对特洛伊的]远征军,不是因为海伦(Hellen)的求婚者们受到其与丁达鲁斯(Tyndareus)的誓约的约束,而是因为他[阿伽门农]是他的时代里最强大的王……我相信,这还是因为阿伽门农继承了权力,并且他是他的时代里最伟大的海上统治者,他能够召集远征军,其他王追随他不是因为慷慨或感恩而是因为恐惧。(《战争史》1.9)

荷马遮掩了这一事实:政治生活——诸邦与诸王的诸关系——的特征在于,与必要或强迫相对立的尊贵(charis)近乎完全的阙如。因此,鉴于所有高等的人类生活都是城邦中的生活,荷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虚假的人类生活画卷:人类生活永远存在于由可怕的强迫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作为智慧,作为关于真理的知识,这种新智慧优于那种老智慧。但是,荷马受到敬慕是因为他以一种最为令人愉悦的方式泄露了他所知道的真理。重要的是,修昔底德并没有简单地否认他的智慧也会令人愉悦:“我的报道不像是故事,这可能不会那么娱人耳目”(《战争史》1.22):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受到适当训练的人来讲,它并不会不如荷马的诗歌那么令人愉悦。修昔底德质朴而庄严的智慧也是缪斯式的(music);它的灵感来自一位缪斯,一位比荷马的缪斯更高等因此也更为质朴而庄严的缪斯。

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即在政治史学中出现的希腊智慧的品性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修昔底德的智慧把自身呈现为荷马智慧的替代物，更确切的说是荷马智慧的完成。荷马的智慧展现了那些经过夸大与修饰的事行与言辞，借以泄露了人类生活的品性。修昔底德的智慧则展现了未经夸大与修饰的事行与言辞，借以泄露了人类生活的品性。这明显还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即便承认修昔底德通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叙述成功地挑战了《伊里亚特》(*Iliad*)的优越性，但对于《奥德赛》(*Odyssey*)又如何呢？最重要的是，即便承认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修昔底德与荷马二者的著作中是根本一致的，但智慧何以需要这样的统一呢？难道智慧不是对普遍、对人类生活之普遍品性的理解吗？智慧何以必须出现在对事行与言辞的展现中？我们必须重复我们的问题：在政治史学中出现的希腊智慧的品性是什么？在这个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真实而详尽的报道中出现的与人类生活的普遍品性相关的智慧的品性是什么？这一问题等于下个问题，即修昔底德为什么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他的主题。因为，如果我们提出修昔底德为什么选择他的主题这一问题，我们就暗示了，他有别的选择，并且这些选择与他实际选择的主题有某些共通之处（否则它们也不会是除它之外的选择）：这就是说，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主题中发现了某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其他可能的主题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发现了某种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为一般性的东西，我们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提升到了一般（the general）甚至提升到了普遍（the universal）。

修昔底德之所以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所有战争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说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所有希腊战争中最大的。他预设战争是一个值得引起智人注意的主题。因为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报道意在成为理解所有未来战争的指南，伯罗奔尼撒战争必定特别适合于理解诸如此类的战争，并且这必定是因为：它是修昔底德所知的最大的战争。首先，“大”（bigness）的优点（virtue）何在？我们在柏拉图的《王制》（*Republic*）中找到了答案。苏格拉底正与他的年轻朋友们一起探寻关于正义的真理。在他的建议下，他们考察了一个正义的城邦而不是一